

# 流亡的風景

## 遊後樂園賦 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

鄭 毓 瑜\*

### 摘要

朱舜水 遊後樂園賦 是中國辭賦史上唯一描寫外國 (日本) 庭園的賦篇，寫於西元 1669 年，清康熙八年，因抗清失敗流亡日本已經十年。以一個明朝遺民的身分，朱舜水不願為清臣虜，東渡至長崎，在日本鎖國時期成為破例允許留居的華人。

留居長崎初期，舜水閉門掃跡，對於亡國遺民的身分充滿憂憤與絕望。直到乙巳 (1665) 年應水戶侯源光國誠摯之請，至江戶講學，舜水流亡生涯於是出現了大轉捩點。一方面是對中國改朝換代已成的定局，正式告別；一方面則彷彿是由糾纏著憂憤、蒼涼的自我陷溺中醒豁了一個出口，開始通往江戶的另一段旅途。

到江戶第五年，舜水以一種歡欣自得的語調寫下 遊後樂園賦，挪借上林賦 的盛世氣象，表徵自己所輔佐的光國卿與所指導的水戶學派在日本文化及政治上已經造成的影響與貢獻。這個透過大賦體式所展布的格局，明顯有別於一般對於遺民書寫總是「黍離之悲」、「新亭對泣」等「危苦之詞」的單一印象；除了流離逃遁、懷歸望鄉， 遊後樂園賦 為本來已經無路可出的流亡生涯，朗現一片柳暗花明的「志」得「道」行 那是朱舜水歷經生死、仕不仕的抉擇關隘後，終於看見的華美風景。

關鍵詞：遊後樂園賦、朱舜水、遺民、賦、水戶學派

---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 一、前言

如果書寫活動是為了詮釋自己，那麼文體的選擇其實就是選擇表現自己的一個面向。作者不是反映環境的客觀中介，但也無法全然主觀率意，文體是主客觀聯繫的焦點，作者從文體的程式規範、寓意型式中恍然看見被書寫出來的世界中的自己。個別的生活遭遇透過文體的模塑，因此參與了一個累積的公共傳統；這個文體傳統累積了世代的讀／寫經驗，提供作者印證、闡發與擴大個別經驗的機會。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就彷如進入歷史文化的迴廊，在一種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傳統的書寫活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末朱舜水所作《遊後樂園賦》，因此不能僅僅由主題內容說它是辭賦史上唯一遊賞異國（日本）庭園的賦篇，<sup>1</sup>更進一步應該探索的是，朱舜水採用鋪寫景物的辭賦體式，與當時身處環境可能形成什麼樣的相互應和？透過辭賦書寫，朱舜水在當時為自己薦介或選擇去認同一種什麼樣的人文傳統？換言之，結合文本所穿織的文體傳統與情境遭遇，才能真切體現《遊後樂園賦》在朱舜水流亡一生中所形成的自我詮釋。

## 二、轉換視野的流亡旅途

《朱舜水全集》<sup>2</sup>中除了首卷收錄早年詩作 15 首，卷二辭賦僅得作於安南的《堅確賦》<sup>3</sup>及《遊後樂園賦》，其餘全為答問、書啟、箴銘等應用文體。而《堅確賦》作於丁酉（1657）三月為堅持不事安南的明志之作，《遊後樂園賦》篇首標誌遊園時間是「己酉春，三月十九日」，距離朱舜水隨鄭成功北

1 許結、郭維森著，《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頁 785。

2 本文所引用舜水作品皆引自湯壽潛刊、馬浮編，《朱舜水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56），以下簡稱《全集》。

3 《世說新語》識鑒篇第 18 則記載「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臺所省殷荊州，殊有確然之志」，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引《易》乾文言曰「遁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者」，說明殷浩隱遁之志乃堅確不移也，頁 221。朱舜水賦名「堅確」或即出自《易》乾文言，以表不仕安南之意。

伐失敗（1659）後流亡日本已經十年，可以說是留居日本後出現的唯一抒情作品。關於所抒發的情志，《中國辭賦發展史》認為朱舜水在「異國景趣間，並未忘卻故國災難和人生艱難（此賦作於甲申之變翌年）」，<sup>4</sup> 末尾所謂「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逆遭」就是暗中披示抗清失敗而流寓日本的心情。但是這說法一方面錯置了寫作年代——將「己酉」（1669）誤認為甲申後之「乙酉」（1645），一方面對於篇末所謂「進退之逆遭」似乎也求之過深，忽略上句是「余酒力不勝，舉足蹢躅」，「逆遭」極可能是模擬醉後傾倚難進之態，致無法秉燭夜遊，窮盡園林之美。

從朱舜水自序看來，這是己酉（日本寬文九年）三月，源光國宰相邀請已經搬至園內的「大日本史編纂所」官員及舜水一起賞櫻宴遊的盛會。<sup>5</sup> 序文談到：

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尚乎虛飾。<sup>6</sup>

這裡讚美源光國優禮賢士、厚待下屬，遊後樂園賦的寫作主旨因此是王侯宴樂群臣而臣屬歌頌主上德業的基調；而所謂「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流連無已」（序文），正可見賞心悅目的遊觀之樂，才是全篇描摹的重點。如果一味從孤臣孽子的角度去比附，其實是無視於朱舜水留居日本前後時期的不同遭遇所帶來的心境變改。明永曆十三年（己亥，1659）鄭成功北伐失敗後，朱舜水復至日本，不同於前幾次是為了藉助外邦援兵以恢復明朝國力，而是熟知一時之間「聲勢不可敵，壤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留在內地只有「毀冕裂裳，髡頭束手」從清朝之俗，於是決定蹈海東渡，以全志節。<sup>7</sup> 當時師事舜水的安東守約及其友人，極力奔走，希望在日本鎖國時期能

4 同註 1。

5 根據重森三玲，《日本庭園史圖鑑》（東京：有光社，1936年）（江戸時代初期）「後樂園」目下所述，寬文元年進入光國卿修建後樂園時期，並將原本在彌生町的大日本史編纂所搬至園內，於寬文九年三月十九日舉辦櫻花宴，朱舜水作有後樂園賦並序表示了當時的情況。頁 18-19。

6 《全集》，頁 4。

7 以上敘述及引文，參考日人安積覺，《舜水先生行賞》，《朱舜水全集》附錄，頁 318-320。至於鄭成功北伐失敗的原因，與安東守約書曾提及軍中「紀律未明，上情不能下究」，又「藩臺（鄭成功）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頁 67），說明了驕縱渙散的明軍從此一蹶不振、無力回天的絕境。

破例讓舜水居留。<sup>8</sup> 確定獲准居留長崎成為亡國遺民<sup>9</sup>後， 答釋斷崖元初<sup>10</sup> 敘及當時心情：「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逋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sup>11</sup>，在「暫借」的前提之下，選擇流亡日本之初並沒有終老的打算，朱舜水說留寓期間只想「閉門掃跡」：<sup>12</sup>

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為昌明儒教而來。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管蒚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幾近相同的字句又出現在後來 答安東守約 的書信裡，「前答他國佛者」云云，同樣是朽索繫石必有不測之禍，同樣申明「不肖本為避難，初非為倡明道學而來」。<sup>13</sup>

為什麼反覆申明自己沒有「倡明儒教」之意？其實留寓長崎之前，舜水早因與長崎譯者完翁及其所引介的安東守約彼此相知相惜，而對於儒學復興於域外有過想像。隨鄭成功北伐前一年（1658），舜水於廈門 答安東守約<sup>14</sup> 書中，就認為「聖賢踐履之學」在中國已是衰微之「世季」，但是在安東守約身上卻預見「開闢而首出」的希望，所以他如此勉勵到：

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

8 《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1978）第7冊，賴橋本著，《朱之瑜》敘及「日本正當鎖國時期，不許唐人留居本地」，頁7。與陳遵之書 舜水自言「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頁13）。

9 答明石源助書（頁35）舜水自稱「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篇中有「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赴國姓之召」為1659年，可見此書作於確定留居長崎後的1661年，而與 答釋斷崖元初 所述心境一致。關於朱舜水事蹟及作品繫年，部分參考李魁平《朱舜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所作「朱舜水年表」，頁267-282。

10 引自《全集》，頁18。

11 共「十七」年是從崇禎帝死、甲申（1644）變後至於辛丑（1661）年，「去冬」獲准留居長崎，即指1660年。參考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臺北：中華書局，1957 臺一版）「庚子（永曆十四年）」下云「冬間，在長崎賃廡定居」引 答釋斷崖元初書 所附按語，頁29。

12 「閉門掃跡」是藉由無所交接傳達心繫故國的志意，《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69 沈炯傳 載沈炯於魏剋荊州後被擄，「以母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卻掃，無所交接」，頁1678。

13 見《全集》，頁80-81。

14 見《全集》，頁74-75。此信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繫於「戊戌（永曆十二年）」下，並認為此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頁22-24。

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

而在爭取居留或剛剛確定獲准居留的時期，否認或放棄原先有過的念頭，除了文字兩度指出的「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可能是針對日本當時佛教盛行，沈錮難起，<sup>15</sup> 像是世俗普遍相信超度、極樂之說而與儒家講求禮法制度明顯不同以外，<sup>16</sup> 還有更根本的原因是一旦出奔流亡，跟隨著朝代、疆域失去的是自己原本確定的身分，與依據這個身分所規劃的人生志業。流亡者的憂憤因此是在於眼見一切逐步失去的不甘不捨與難以拉挽，這個時候任何曾經抱持的志業都成了無根空想。居留長崎第一年（辛丑，1661），舜水作陽九述略<sup>17</sup> 由親身經歷剖析「致虜之繇」、「虜勢」、「虜害」與「滅虜之策」，其中或是對於「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激切的指斥，或是對於「逆虜猥亂中華，憲綱掃地」的痛心疾首，混雜著眷戀與失落是朱舜水面對遺民身分的起伏難平。

然而三年後，<sup>18</sup> 當小宅生順欲薦舜水於水戶侯源光國，情況就有了改變。答小宅生順問 中，對於講學於江戶，舜水雖然自謙「才德菲薄」、堅持「不論祿而論禮」，仍憂心「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sup>19</sup> 但是同時所謂「（聖人之學）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又「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明顯對於儒道傳播萌生些微希望，而原本堅持「非為昌明儒教而來」的心情有了鬆動。這也可以由舜水與安東守約的書信中看出：

欲欲圖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以自給。  
不佞於重門高堂，居之而無愧色，華門斗室，安焉而無戚容。灌園之舉，須江戶事成之後。<sup>20</sup>

15 題 聖像——子在川上圖 曰「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崇信仲尼者三人焉。然其俗尚浮屠，千年沈錮，」，《全集》，頁 280。

16 比如後來 答中村玄貞問 說中國治喪，「浮屠不與」，所謂超度升天堂、不超度則沈淪地獄，皆愚弄子弟之迷信。另外如 答辻達問 也認為超度亡魂、早升極樂是愚弄無知。分別參見《全集》，頁 200、209。而 答釋斷崖元初書 也說到儒、佛之爭，「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為徒爾紛紛哉。」（頁 18-19）

17 引自《全集》，頁 294-302。篇末自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

18 梁啟超繫舜水與小宅生順答問書札於甲辰年（永曆十八年，1664），《年譜》，頁 39。

19 以上分別引自《全集》，頁 205、202。

20 皆引自 答安東守約書 ，頁 78、81。

「抱甕」、「灌園」皆隱居田畝、躬耕自給之意，<sup>21</sup> 這應是激切憤慨之後，自我調息的療傷止痛；但長崎居留不久又說灌園之舉須在「江戶事成之後」，可見舜水遺民心境的再度轉折，東行之事已然確定。

梁啟超說「江戶禮聘，實先生（舜水）全生涯之一轉捩」，<sup>22</sup> 當然，會有這轉捩點與源光國本身的人品作為、對待舜水的態度都有關係。德川光國是德川家康之孫，與第三代大將軍德川家光是堂兄弟，繼承父親德川賴房之藩位，為第二代水戶侯。當時以本家親藩位居宰府，好學勤政，希望以文德治平天下。<sup>23</sup> 對於源光國的知遇，舜水如此說到：

不佞蒲柳之姿，迂拙之性，誠哉齊門之瑟也。不知何以辱水戶上公知遇，事事出於純誠，雖累牘不能盡，獨愧無以報稱耳。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儉禮下，使得為所欲為，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為之，世無不可教化之地。<sup>24</sup>

源光國禮賢之純誠，由不敢稱其字「魯瑛」，而再三詢問是否有庵齋之號，最後朱之瑜只好以家鄉舜水為號以方便稱呼，這件小事即可得知。<sup>25</sup> 地異俗殊而又與親友生別，源光國的敬重體己，深深感動了朱舜水；<sup>26</sup> 到江戶第二年，寫給摯友陳遵之信中，<sup>27</sup> 又描述了源光國如何令人信服的盛德：

上公乃為當今之至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為三家，聖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上公讓國一事，為之而泯然無跡，真大手段。舊稱太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而有其跡，尚未是敵手。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做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

21 如《莊子》天地篇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引自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頁433）；《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68 商君列傳 趙良語商君曰「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頁2235。

22 《年譜》，頁39。

23 以上關於源光國的簡介，參考梁啟超《年譜》「甲辰」下所述（頁39）及王進祥《朱舜水評傳》第2章弟友記「七、德川光國」（臺北：臺灣商務，1976），頁79。

24 引自 答奧村庸禮，《全集》，頁88。

25 見 與安東守約書，《全集》，頁72。

26 答吉弘元常「國變以來，倏忽分地，人情難割，地異俗殊，唯有上公推赤心，置人腹中」，《全集》，頁66。

27 到江戶第二年（1666），源光國以舜水老病須人服事，勸其喚孫兒前來，故舜水寄書二封，其中一封即 與陳遵之，其中有「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全集》，頁12-13。

立致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在這裡朱舜水用一個非常具體的事例——如同伯夷、叔齊的讓國來說明光國卿的德行。夷齊原為孤竹君二子，因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而相繼去國，<sup>28</sup>這大概是用來譬擬源光國身為幕府親藩，位居宰輔，但絲毫沒有權門專柄的非分之圖；尤其因朱舜水認為史書最能體現義理人情，<sup>29</sup>光國於是集合學官編修《大日本史》，貫串全編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尊王斥霸以正君臣名分。<sup>30</sup>但是自己就是幕府本家，不能明白倡言，因此藉助史書編撰體例，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模仿世家或藩鎮列傳之例，傳播尊王思想。<sup>31</sup>朱舜水認為源光國這番不露痕跡的作為，甚至比夷齊高明，換作生於中國必然成就和樂治世，足以打破今不如古、外國不如中國的世俗陋見。末尾他表明，早年三番兩次逃避明朝徵召，棄功名如敝屣，如今為光國卿所用，其實不是垂暮之年反而專意「立功異域」，而是「樂觀其德化之成」。不願追求功名是一直以來未變的個人心志，但是，舜水在這裡明顯將文德教化置於轉化個人心志與超越國族<sup>32</sup>界域的地位；江戶之行的重要性也正在此，它提供一個新的相對於中國的觀看視野，足以擺脫亡國遺民後無可顧、前無可望的流亡狀態，而發現自己正參與一個連續不絕、無限擴展的文化流脈。

這個時候，明朝、異域或中國、日本，與朱舜水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這並不是刻意選擇或放棄任一方，而是時間在無形的關係版圖上自然琢磨出皺褶層次。對於六十歲才出奔流亡的朱舜水而言，家園故舊是憶念深處難以承受的痛處，他曾經自述這種苦痛：「今日捨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為舉目言笑，無與為歡者。」在獲准居留長崎至於江戶之行以前，朱舜水所以會有閉門掃跡、抱甕灌園之思，其實正是一種自苦繼而自絕於人間

28 參見《史記》，卷61 伯夷列傳，頁2123。

29 答奧村庸禮「中年尚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為愈也。《資治通鑑》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吻合，事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繇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全集》，頁87。

30 參考《朱舜水評傳》第2章「七、德川光國」，頁81。

31 此處參考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長沙：岳麓書社，1985）（廣注）「73、愛國志士」下所引《日本國志》國統志及《人境廬詩草》卷3，以及黃遵憲之按語，頁669-670。

32 「國族」一詞出自舜水 安南供役紀事 所謂「虜氛未滅，國族難歸」，《全集》，頁303。

世的蒼涼心境。<sup>33</sup> 漸漸地，這種痛楚稀薄了現實質量成為心頭一抹暈黃，沒有忘記但是回不去了，就像 與陳遵之 書最後所說：

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纒纒。至此閒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徒虛想耳。

再見是「虛想」，「永訣」倒成了事實，這種自覺無疑是流亡者重新看待自己與家國之間關係的轉捩點，一路出奔到了這裡，終於要面對改朝換代已成的定局，正式告別。

### 三、江戶後樂園：告別與轉身的出口

告別是一種兼具回顧與前瞻的姿態，可以平靜回望過去，正因為有了指向未來的相對立足點；換言之，此番告別對於朱舜水的流亡而言，彷彿是由糾纏著憂憤、蒼涼的自我陷溺中醒豁了一個出口，開始通往江戶的另一段旅途。到己酉（1669）年以七十歲向源光國告老（雖然光國沒有答應）次年（庚戌）自做棺木安排後事為止的五年間，可以說是舜水流亡路上由絕望重燃起希望、由亡國遺民至於異國重臣、由致力傳道至於告老歸田的心境變化時期，而其中作於己酉三月的 遊後樂園賦 毋寧就體現這五年間從江戶向前踏出，而逐步清晰繁盛的生命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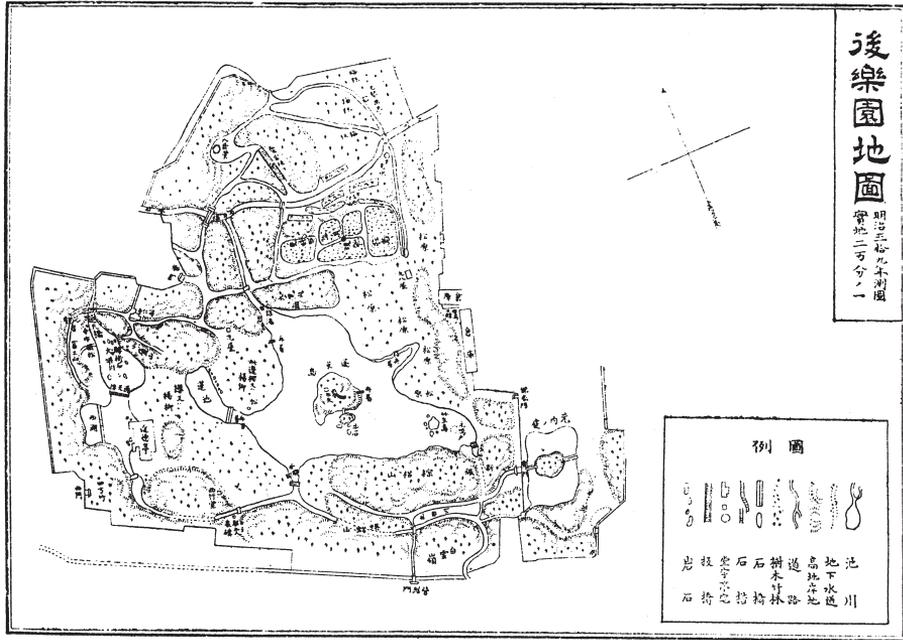
現位於東京小石川的「後樂園」(參見圖一)，<sup>34</sup> 是從源光國父親德川賴房時代開始興建，「當時園池既模仿清水、音羽等地的景致，並依賴房卿要求，命名為小廬山」；賴房卿逝世後，源光國繼續修建工作，並常常在園內舉辦詩文雅宴，又依據朱舜水的指導，加入了許多中國風味的園景，「建築從前沒有的唐門、圓月橋、文昌堂、得仁堂」等。<sup>35</sup> 在日本古典園林史上，

33 引文出自 答某書，又曰「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為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持，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全集》，頁 39。梁啟超繫此書於「癸卯」（永曆十七年，1663），《年譜》，頁 38。

34 根據《日本庭園史圖鑑》所述，後樂園歷經江戶大地震、關東大地震燒毀部分建築物與樹林，加上明治年間於園內設造兵司，後又改成東京砲兵工廠，失去本園東部及北部，因此今日後樂園建築是整修重建後的新貌。頁 21-22。

35 同前註所引書，頁 18-19。

圖一 後樂園地圖（摘自《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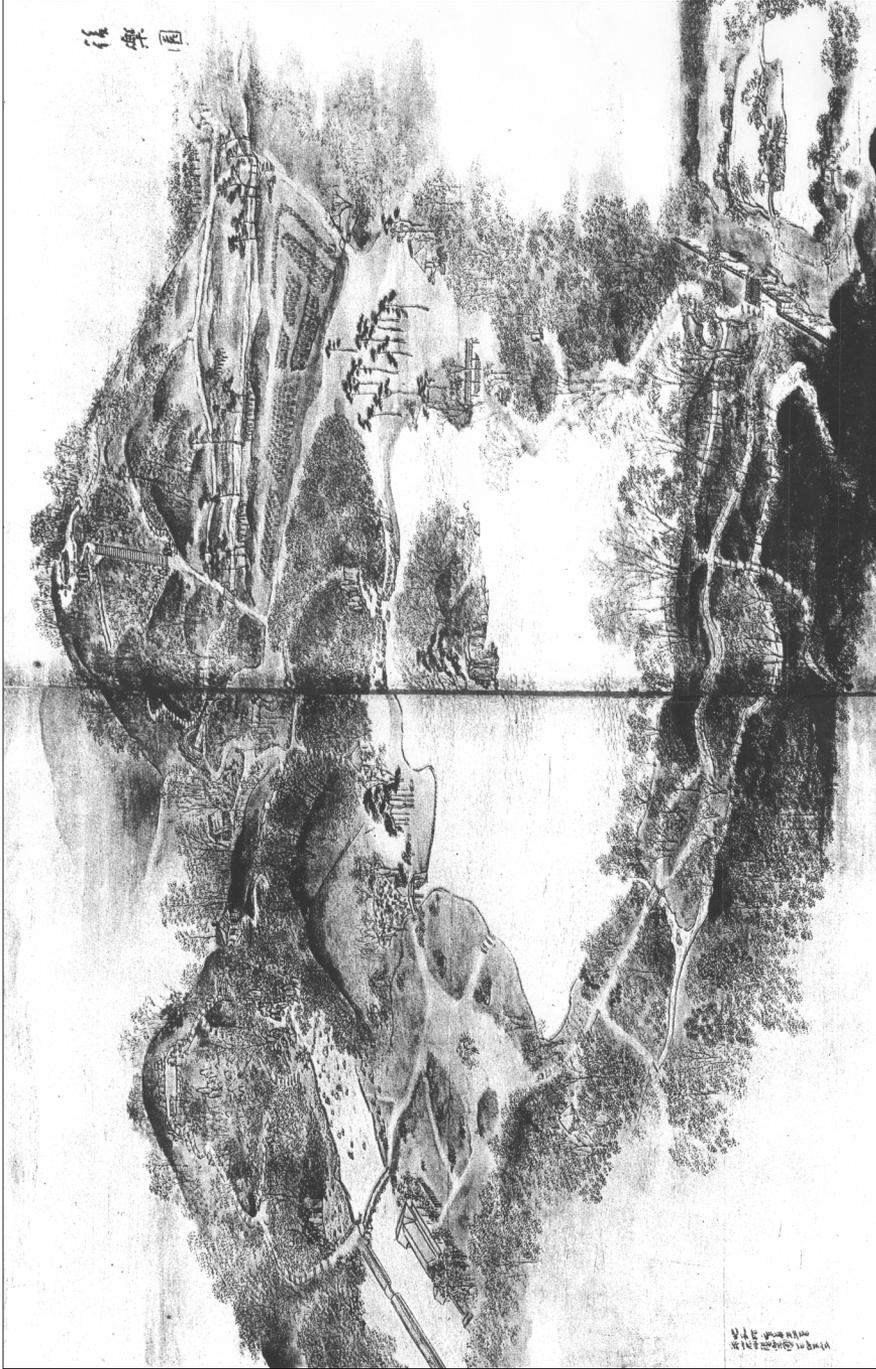
載所紀園樂後・圖測實園樂後代時治明

後樂園是江戶初期「大池泉、大迴遊」式諸侯庭園中建築年代最早的代表典型。<sup>36</sup> 所謂「池泉」、「迴遊」型式是指結合舟行與步行雙重遊賞趣味的庭園；池泉部分早從六世紀末（飛鳥時代）開始就受中國秦漢神仙傳說的影響，建築蓬萊仙島作為觀賞中心，池泉周圍廣大園林則設置許多模仿自名勝（尤其是中國名勝，如後樂園的廬山、西湖）的縮景或亭榭，然後用許多複雜的迴遊道聯繫起這些景點。<sup>37</sup> 這樣一座園林，可以近觀、遠眺，可以移步換景、可以端坐遠想，來來回回仔細遊賞，彷彿隨時變換節奏的音樂宴饗（參見圖二）。

己酉年三月十九日， 遊後樂園賦 在櫻花盛開的芳苑中拉開序曲，眼

<sup>36</sup> 同前註所引書，頁22。

<sup>37</sup> 參考前註所引書，頁23-24，以及程里堯，日本古典園林藝術，《中國建築史論文選集》（臺北：明文書局，1973），頁641-647。



圖二 後樂園寫生圖（摘自《日本庭園史圖鑑》）

前盡是麗色蔥青，一片春意喧鬧。東南入口處唐門上懸掛的匾額，是朱舜水自己命名與題字的「後樂園」，<sup>38</sup> 進門之後，沿著園的南邊蜿蜒狹長的迴廊曲徑前進，時而接上浮臥川流的長橋，時而瞥見花樹外的田野風光，一路上枝蔓穿織，芬芳斑斕。漫步來到隱於花間水際的團瓢亭，<sup>39</sup> 其中安置了平安時代末期詩人西行的塑像，<sup>40</sup> 賦文這樣描述：

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沈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子宜置是中。<sup>41</sup>

西行原名佐藤義清，出身武士家族，二十三歲出家後雲遊四海，留下許多詩歌作品。此處舜水正是從西行既是武士又成為詩人、行僧的身分轉換，點染出神遊物我、超越世俗的人格形象；塑像置於丘壑間的簡樸小亭，正足與廟堂相遠，體現逍遙山林的姿態（參見圖三 南部）<sup>42</sup>

接著順時針式的從南往西邊走，西湖、小廬山的縮景分別在左右兩邊，湖上有西湖堤，而小廬山北方有得仁堂（參見圖三 西部）。得仁堂祭祀太伯、夷、齊，朱舜水特別提到「龍門以冠世家列傳，元侯（光國）之志也」。《史記》以太伯與夷、齊事分為世家、列傳之首，三人皆有讓位出奔，不私天下之至德，太伯的義行甚至感動荊蠻夷族，從之來歸而立吳國。<sup>43</sup> 前文引舜

38 根據重森三玲的考察，朱舜水的題字是由御用工人太田久藏以手工方式用金屬將文字表現出來。《日本庭園史圖鑑》，頁 24。

39 遊後樂園賦 曰「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如掌」，此句下有注文（未知是何人所加）「一亭兀然，名曰團瓢」。引自《全集》，頁 4。重森三玲也談到園的南邊古時有團瓢亭，《日本庭園史圖鑑》，頁 23。

40 此人原名佐藤義清（1118-1190），出家後法號西行，有《山家集》傳世，參見窪田敏夫，《和歌 歌人物語》（東京：ポプラ（popular）社，1966），頁 107-115。另外在重森三玲對後樂園的描述中，分別談到園中有團瓢亭及西行堂，頁 18 後樂園古圖中有團瓢亭，頁 23 相近地點則有西行堂而沒有標示團瓢亭，文末所附後樂園平面圖則在西行堂下括號標示（團瓢亭）；遊後樂園賦 說團瓢亭「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或許說明了由於團瓢亭置西行像致後人改稱「西行堂」。

41 引自《全集》，頁 4。馬浮本首句讀為「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顯然未知「西行」乃日本古詩人法號。

42 「一丘一壑」句出自《世說新語》巧藝 篇（第 12 則）「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裡。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6），頁 543。謝鯤語出 品藻 篇（第 17 則），頁 386。

43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記「遷生龍門」（頁 3293），「龍門」指司馬遷。吳太伯世家（卷 31） 伯夷列傳（卷 61），分見頁 1445、2123。

水與陳遵之信中，讚美源光國讓國之舉較諸夷齊更為泯然無跡，所謂元侯之「志」，因此可以解釋為藉讓國之舉成就尊王一統的心願。固然關於夷齊典事，歷來還有一個更為大家熟知的後半段，是拒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像朱舜水蹈海東渡，安東守約就以夷齊比其節義。<sup>44</sup> 但是針對寫作《遊後樂園賦》這個時期，或說是知遇於源光國以後，夷齊事典中的讓國成分就顯然比採薇或餓死來得重要。這誠然與光國個人德業有關，但同時對於朱舜水自己而言，是否也意味著更細膩地思索了亡國遺民的立場——在選擇為明朝殉死或倡明王道於異域（如太伯入荊蠻）之間，有了不同於世俗成見的體會。

遊賞活動因此在利用步履身經構畫出方向、區位之外，必然也引發神思遠想，眼與心的交遇讓外在的景觀都有了內在的寓意。在西湖邊上聽泉弄流，一方面由西湖堤實景想到蘇公陂、召伯堂，借以期勉光國卿勤治愛民；<sup>45</sup> 一方面潔淨昭澈的清流，又不禁令人吟詠起「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的孺子之歌；<sup>46</sup> 後來放眼整個湖面波動蕩漾的景象，前水後水滔滔滾滾，「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舜水不禁也有「子在川上」的感嘆，<sup>47</sup> 而所謂「汨英雄於逝波」，應該是將屆七十的舜水所以直切比諸仲尼的憂憤不平。

或許正為了解脫人世的憂愁，往北的遊賞（參見圖三：北部）經過「通天橋」及舜水指導下完成的「圓月橋」，<sup>48</sup> 陡然一意地向上攀升，高度落差所形成的豁然開朗，甚至彷彿登仙遠遊、笑傲乾坤的姿態；<sup>49</sup> 當園邸的千門萬戶盡收眼底，這種軒昂意氣不但一掃前文老大傷逝之感，更重要的是烘托出源光國水戶侯國的興盛規模。所謂「下瞰千門」之樂，《史記》孝武本紀說漢武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sup>50</sup> 後來在京都賦裡就成為描繪繁華宮苑

44 舜水 答安東守約「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疚。賢契乃獨上推夷齊，下逮魯連，謂為義士，不佞冒昧承此，罪戾轉深」。《全集》，頁161。

45 召伯事出《詩經》甘棠，蘇堤事見《宋史》，卷338 蘇軾傳。

46 《孟子》離婁 上「有孺子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引自朱熹《四書集注》孟子卷7（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頁7。

47 出自《論語》子罕，引自《四書集注》論語卷5，頁5-6。

48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7的首段文字敘述及頁26、27附圖。

49 賦文曰「飛雙黃鳥於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為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其中黃鳥雙飛或許典出王喬化物飛行的神術（參見《後漢書》，卷82 方術傳，臺北：鼎文書局，1979，頁2712）。

50 《史記》，卷12 孝武本紀，頁482。

的重要徵象，比如：

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闢。（班固 西都賦）<sup>51</sup>

閉庭詭異，門千戶萬。（張衡 西京賦）<sup>52</sup>

都是表現重門疊戶，廣拓連綿。從現存後樂園古圖看來，舜水沿著蹬道攀登應該會連接到北邊的「愛宕阪」，<sup>53</sup> 從愛宕阪頂端可以俯瞰適才一路走過來的後樂園西南方的風光，順著阪坡下來映入眼簾的則是散布在北邊的廣大水田，前文有「縈迴鳥道，瞥見平田」，正是從南邊曲徑向北遠望阡陌。江戶時期諸侯為了讓藩士體會農家苦辛而在庭園內設置耕地的很多，後樂園的水田景象應該也有這個用意。<sup>54</sup> 不過，從 遊後樂園賦 看來，對於攀高與低降的移步換景，舜水還賦予另外一層意義：

既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疃，啟柴扉，出沒樵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彷彿田家之樂矣。

此處引用《大戴禮記》勸學篇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sup>55</sup> 強調君子必須言行謹慎，不可貪多驚遠，其實是為了調節上文意氣昂揚、笑傲天下的姿態，輔之以踏實穩妥的節度。就如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所說：

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sup>56</sup>

換言之，地勢的高低方位牽動眼界意圖，同時也隱喻人世進退朝隱的分際；從得意廟堂之上，轉而自我戒慎，甚至是嚮往山林之趣，兩種不同的人生情境也體現在園林景致的規劃上。

有一點當然必須辨明，後樂園中的田野風光是諸侯庭苑的觀賞景致之一，並不同於一般絕意仕途的隱逸居所。這可以由底下的描繪與評論文字見出：

登其堂，砢砢尋常，互道玃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實氎氎，璀璨奪目矣。

51 引自《文選》卷1（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10。

52 同上註，頁32。

53 《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3。

54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7。

55 引自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7（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133。

56 引自《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前集卷32，頁394。

余覽天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灑，小橋仄徑，迂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勝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

首段文字，是描寫水田附近亭堂及通道的地面鋪砌，運用五彩繽紛、大小均勻的玉石拼嵌而成，一眼望去就如同鋪上西域罽賓國特產的毛氈，那樣文采亮麗。明末計成《園冶》書中曾提到砌地鋪街必須達到如同織錦一般的效果，所謂「吟花席地，醉月鋪氈」，<sup>57</sup> 舜水從鋪地一事的精巧來突顯後樂園建造手法的細緻，另一方面似乎也透露了舜水在這個時候具有如同名士一般講求風雅的閒逸情致，這又可以再次說明，流亡的心情並不能以憂憤一概化約。再從所謂「罽賓氈氍」來看，《漢書》西域傳述漢代武帝時始通罽賓，其民巧，善於「織罽、刺文繡」，<sup>58</sup> 由此襯托出這裡的田家風光不只是精巧，還是權貴之家才有的格局。底下的評論因此講究在不誇炫富貴、也不刻意寒儉中求取精巧雅緻的平衡表現；後樂園北邊的田野茅店，在舜水眼中，正是精工卻猶如天成的園林造景。

從水田附近可以順著迴遊道路通往原入口處唐門的方向，這時候東邊以池泉仙島為主體的景色成為遊賞重點（參見圖三·東部）。舟遊之前，先是一場山珍海味、桂液瓊漿的豐盛宴饗，兕觥交錯漸入愴恍之境；於是登舟溯洄，繞行蓬萊，竟彷彿有仙遊的假想。舜水這裡用「睇望丹丘」<sup>59</sup> 比擬池中的蓬萊島，據考證，此島以石為景，堆建成大龜背島的形狀，且有瀑布高掛，奇石險瀑，令人歎為觀止。<sup>60</sup> 舟遊途中，舜水乘興歌詠，「戲唱吳歎以相謔」，「吳歎」出自《楚辭》招魂「吳歎蔡謳」，<sup>61</sup> 左思《吳都賦》也提到「荊艷楚舞，吳愉越吟」，<sup>62</sup> 蓋指吳地歌謠。這裡朱舜水特別在吟唱之前曰「余，吳人也」，與賦文開頭謙稱自己是「異邦樵朽」，為通篇兩處表明身分之語，但都沒有標誌亡國遺民的用意；換言之，吳地對比於異邦所可能牽引的

57 引自計成，《園冶》卷3 鋪地（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頁180。

58 引自《漢書》卷96（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885。

59 《楚辭》遠遊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丹丘，晝夜常明也」。引自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253-254。

60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4。

61 《楚辭補注》，頁334。

62 引自《文選》卷5，頁111。

諸如孤臣之悲、流亡之痛、望鄉之情，賦文中並沒有明顯觸及。也就因此，雖然是遊賞異國庭園，但不是用以對照故國之思，甚至應該說，*遊後樂園賦* 圓融交錯櫻花、西湖、夷齊、西行、丹丘等中、日人事風物，正顯示這時候朱舜水心中並不像初抵長崎那般「暫借一枝」的過客心態，而是可以彼此無別地融入與欣賞了。

#### 四、從亡國遺民到盛世新民

如果說朱舜水作 *遊後樂園賦* 並沒有一種針對國族的價值對比的心態，也就是說他是在春日三月自然而然地流連於櫻花盛開的日本風景，在溯洄池泉絕景時自然而然地唱起家鄉吳地的歌謠；賞愛櫻花並不因故國之思而減卻興致，吟詠吳歎亦不因身處異國而扭捏變調。就是這樣一種隨興而放曠的態度，他引吭歡唱，以下是兩首中的第一首：

因為棹歌行曰：泉源漚漚，桂楫松桴。水安流兮，橈櫂輕揉。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勞天下到於今，到於今，載明德也悠悠。

整首以散行又帶有「兮」字句的南方風謠，運用操舟水上、君立民治的親切類比，來稱頌光國卿以天下為心的憂勞。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宴樂中流而棹歌助興，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出現在漢武帝 *秋風辭*，其中抒發行幸河東，祭祀后土，與群臣泛舟汾河的歡會感觸：<sup>63</sup>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同「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秋風辭* 最後以流水年華寄託傷逝哀情，但其實與憂生畏死相牽引的是求才若渴的焦慮與背後建立永世帝業的雄圖。*遊後樂園賦* 不是由主人源光國自我抒發，而是舜水由下而上的諷頌，櫂歌的內容因此明白直接地以盛德治績相期許。由 *秋風辭* 的「發櫂歌」來聯想 *遊後樂園賦* 的「棹歌行」，同樣在一場君臣歡會中，舜水直接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盛主明君來看待水戶侯源光國。

63 參考郭茂倩《樂府詩集》卷 84「雜歌謠辭」(臺北：里仁書局，1980)所引《漢武帝故事》，頁 1180。

這樣一體無別的文化視角，不但舜水即興的櫂歌可以有「秋風辭」的聯想，甚至遊賞後樂園在舜水感覺中就彷彿是走進漢武帝的上林苑；兩首棹歌之後，賦文末尾說到：

已而日在高春，上林丞尉奮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之概，甚者欲秉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蹢躅，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屯遭。

漢武帝的上林苑有丞尉、奮夫掌理園中禽獸，<sup>64</sup> 舜水這裡用以比擬後樂園中的管事官屬，除了證明上文由「棹歌行」聯想到漢武帝「秋風辭」，絕非平白無端；更重要的是，「遊後樂園賦」因此有了「上林賦」所表徵的無論文體、政治或文化上的種種可能寓意。司馬相如作「上林賦」本為鋪陳天子遊獵之事，以區辨「子虛賦」所述諸侯苑囿，<sup>65</sup> 因此極盡連類聚物之能事，「遊後樂園賦」除了遍歷四方，在鋪張飾麗上尤可以看到宮廷大賦的影子，例如：

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敷紺綠以乘暄。轉落英之曲逕，經臥波之長橋。爭妍競豔，目眩心招。輯群英以作迴廊，蹠踐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廈屋，旖旎組訓列三千。少焉羅珍饌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溫溫以有禮，復命戒以諄諄。

所謂「群英」、「萬卉」、「水陸畢陳」，就如同「上林賦」所描繪的「眾香」、「群浮」、「萬端鱗萃」，<sup>66</sup> 展現了體物瀏亮的賦體特色。而宮廷大賦連類聚物的目的當然在於體現君王坐擁天下的華奢尊貴，四方風物之外，還有就是苑囿中精雕細琢、巍峨矗立的宮館臺閣，最能表現這種氣勢。「上林賦」說到：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閭闔，宛虹拖於楹軒。<sup>67</sup>

64 《史記》，卷 102 張釋之傳「（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奮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乃召釋之拜奮夫為上林令」，頁 2751。

65 《史記》，卷 117 司馬相如列傳「上讀子虛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頁 3002。

66 「上林賦」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臙鶻鷁鷁，群浮乎其上。吐芳揚烈，郁郁烈烈，眾香發越」，引自《史記》，卷 117 司馬相如傳，頁 3015、3017、3022。

67 同上註，頁 3026。

遊後樂園賦 也有一段描寫是：

盤踞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氣軒軒，飛雙黃鳧歛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為樂也融融。

朱舜水用「千門」典事，如前所言也出現在描述漢武帝興築的建章宮，於是從後樂園嚮慕上林苑，在這裡又得到一個證明。《史記》孝武本紀 記載漢武於柏梁燒毀後，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勝過柏梁原有規模：

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sup>68</sup>

西漢至於武帝時期，國家無事，倉廩盡滿，富足繁榮無以過之，<sup>69</sup> 加上信奉術士仙道，大造臺閣宮觀，因此除了是太平盛世的表徵，還有企望招來神靈，以求長生久視的目的。<sup>70</sup> 宮館高入雲霄，池苑擬造仙島，人間君王的慾望雄圖表現在具體建築上；上林賦 說星辰虹霓穿門入闕，遊後樂園賦 說如同高飛重霄，可以笑傲乾坤，都是以漢武苑囿為摹本的文學筆法。

然而除了由建築高偉隱喻盛世太平，就像上林賦 末尾，以戒除奢侈、與民為利而「興道遷義」作為諷諭，<sup>71</sup> 遊後樂園賦 也談到主政治民必須「跬步」謹然，流惠成德，換言之，存在大賦體式中的苑囿風物都不只是物質性或政治性指涉，更進一步負載道德寓意 必須由奢華反悟節儉，必須由權位反求明德，這對於鋪張揚厲的大賦而言，因此是很難達成的閱讀效果。但是，就整個文體的書寫成規來說，並不能否認它藉由財富聲威的描摹意圖轉進道德仁義的訴求。朱舜水顯然也是依循這個體式慣例，這並不是說朱舜水的 遊後樂園賦 就是模擬上林賦，而是挪借了以上林賦 為代表的體國經野的盛世氣象；遊後樂園賦 因此不只是紀遊、讚頌，更重要的是，他自自然然地進入（或說參與）這個文體的書寫歷史，將日本水戶侯

68 《史記》卷 12，頁 482。

69 《漢書》，卷 24 食貨志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頁 1135。

70 《史記》，卷 12 孝武本紀，記載公孫卿上武帝曰「今陛下可為觀，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頁 478-479。

71 《史記》，卷 117 司馬相如列傳，頁 3041-3042。

國放置在中國第一個典型的帝國盛世的背景中來考量，將源光國的功業勳績納入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來期許。

因此當朱舜水選擇用鋪聚性的大賦來書寫宴遊，是他必然從後樂園風物「看見」了他所認定的太平盛世，必然在源光國的身上「看見」了可能成就的德業政績。但是，源光國與漢武帝有什麼相似之處？或者說朱舜水選擇了什麼面向的漢武帝來譬擬源光國？《朱舜水全集》答小宅生順問 有兩處具體談到他對於漢武帝的看法：

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為最。

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為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sup>72</sup>

這兩則大抵都是小宅生順憂心日人文章不及中國，而舜水根據中國歷史經驗加以寬慰。在中國歷史上，舜水認為文章之盛莫如西漢；而西漢的文字論述最主要是宗經載道的「聖人之學」，這必須歸功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表彰六經。舜水並沒有否認漢武帝作為一般政治帝王的慾望圖謀，但是他特別從文化上的聖教德化來肯定漢武帝的萬世功業。進一步可以說，當他將後樂園視如上林苑，以漢武帝的歷史地位期許源光國，其實也等於是呈現了當前他自己在日本的處境，是一種文德昌明的大有為盛世。

一種「文化的」盛世，而不是「政治的」盛世，因此得以實現於任何地域，讓疆界性的家國限制消弭無形。尤其在 答安東守約 書信中，不但稱許安東守約是「聖賢真種子」，<sup>73</sup>也說到自己於「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為親。凡遇英才，樂於講進」，既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門牆之間別。<sup>74</sup>日人如果是傳播聖賢之道的種子，日本也就得以成就聖賢之道實現的盛世。朱舜水對於朝代、家國興亡因此有以下看法：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

72 分別引自《全集》，頁203、205。

73 《全集》，頁84。

74 《全集》，頁161。

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sup>75</sup>

留居日本以後回顧明朝的覆亡，朱舜水直指「聖教隳廢」這國家成立的「第一義」的失守，如同 陽九述略 由士大夫之喪廉恥、競功利談明朝如何自取滅亡，<sup>76</sup> 因此他對於江戶興學之舉非常期待，也認定這將是日本興盛之兆。從這個角度探究興衰，於是可以擺脫固有的族群、疆界或國號帶來的價值迷思，而定位在一個「非政治性」的人文道德層面。

從乙巳年（1665）源光國迎舜水至江戶開始，倡行聖教或聖人之學就彷彿是種子落了地，重新尋得生根萌芽的契機，朱舜水一個亡國遺民成為另一個盛世的新民：

伏願好善好士，興讓興仁，舍己以從人，居尊而忘勢。 續舊邦而作新民，與斯人而入聖域。之瑜臨啟，可勝歡欣踴躍之至。<sup>77</sup>

這裡除了表現對於源光國的期待，其實那「歡欣踴躍」之情無寧也即是對於自己即將輔佐聖教的實行，即將參與一個舊邦的興革關鍵而無限欣喜。到江戶第二年（1666）元旦，舜水在賀源光國書中，勉勵源光國實踐孔子念茲在茲的「大同」思想，藉「大道之行」致「雍熙之盛」，並且以一種誠摯而急切的語氣說到：

瑜居恆讀此書（大同篇），慨然興嘆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然而不能也。茲幸際知遇之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為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違，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不幾虛此大美之業，聖賢之姿耶？<sup>78</sup>

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不但可行，而且在源光國治下親見大道之行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朱舜水在這當中發揮的影響力當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朱舜水於儒學中重實功實用，將中國經世濟民的禮儀、制度、文物等介紹到日本，一掃當時日本知識界崇佛說理的空疏之弊；另一方面由源光國領軍的水戶學派，追隨朱舜水倡議春秋史學精神，編修《大日本史》宣傳尊皇思想，為日後廢藩置縣、一統國家而實施維新體制奠定了基礎。<sup>79</sup>

75 答安東守約，《全集》，頁82。

76 陽九述略 首段「致虞之繇」，《全集》，頁294。

77 與源光國啟，《全集》，頁128-129。

78 元旦賀源光國，《全集》，頁41。

79 關於朱舜水的學術思想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請參考錢穆，《讀朱舜水集》，《華岡文科

朱舜水曾經形容他自己所倡行的「道」的功用是「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飢」，充分說明他的學說是普遍於日用人倫之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不論男女尊卑賢愚，皆可實踐。<sup>80</sup>到江戶後第三年（1667），舜水間或至水戶，對於水戶學風的興盛，有如此傳神的描述：

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為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以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sup>81</sup>

白髮老者尚且扶杖聽講，而感嘆過往昏昧如夢，如今聞道夕死可以；舜水推動的水戶學說之深入人心，儒道實行於異邦的情況於此可見。次一年（1668）源光國四十壽序中因此說到源光國立德行道，「今者小試之，而民風已變」，歡欣鼓舞、家絃戶誦的昇平景象，「可彈指而冀矣」。<sup>82</sup>對於朱舜水而言，身在中國時期既以世亂而拒絕出仕，初至日本又充滿憂憤而閉門掃跡，直到六十六歲以後，知遇於源光國而竟致於可以面對這樣「趨近」文化盛世的處境，可說是絕望的一生中原來沒有預料的轉機，作於七十歲（1669）的遊後樂園賦於是歡欣快意地模擬宮廷大賦的頌美文體，援引漢武上林的歷史典事，應該就是這逐步朗現的人生出路非常貼切自然的寫真。

於是朱舜水為源光國這座邸苑題名為「後樂」園，明顯出自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名句，表露一種先憂後樂、苦盡甘來的實踐過程。中國歷史上，南宋賈似道早就擁有取名為「後樂」的園林，並且作這樣解釋：

園圃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浮遊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遊特其寄焉者。噫，使園圃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sup>83</sup>

學報》，12期（1980.3），頁1-5；盧守耕，鄉賢朱舜水先生及其對於日本學術思想及建國之影響，《餘姚史料》，3期（1978.1），頁30-34；賴橋本，朱舜水與日本文化，《國文學報》，7期（1978.6），頁57-64；戴瑞坤，一代儒宗朱舜水先生，《逢甲學報》20期（1987.11），頁1-25；及李甦平，《朱舜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80 答小宅生順問，《全集》，頁202。

81 與安東守約，《全集》，頁160。本文依梁啟超《年譜》繫於永曆二十一年（1667），並據按語「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頁46。

82 引自《全集》，頁225。

83 引自周密，《齊東野語》（臺北：廣文書局，1969），卷19，頁298-299。

賈似道奸佞專恣，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大言不慚；<sup>84</sup> 但是這番針對「後樂」的說辭，卻很切合朱舜水寄託在這座日本主題園的深層心境。後樂園中山光水色，花樹華美，的確適於遊觀遠想，但朱舜水認為這必須是有前提的。遊後樂園賦在「斯園殆甲於天下」後，加入一段對答：有人說擁有了這座天下名園，那麼源光國大可以悠哉游哉，逍遙山林，「樂其樂而忘其憂焉」，但是舜水回應說，當朝臣勞悴從公，君侯又如何能有閒情逸樂？並且輯錄前人詩句而詠之曰：

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風乎几席，來爽氣於西山。慮萬幾之叢陸，爭得效十畝之閑閑？

雖然以南風之歌、西山朝氣來襯托如同陶淵明歸去來的卓犖放曠，<sup>85</sup> 但是舜水最後反問：日理萬機的君侯，何時得以真正歸於農圃，不干世事？這個問題早在兩年前（1667）的「高枕亭記」<sup>86</sup> 中，就已經有過思索。水戶侯源光國於都城近郊興築別館，題其亭曰「高枕」，舜水對於這個主題有非常嚴苛的標準，他認為只要邦國之內有「一德之未孚」、「一事之失理」，君侯就無法偃然高枕；所以必須等到「治定功成，慮周理得」，也就是確實達到「後樂」的真義——「天下常治而無亂」，這時候才能真正高枕無憂。<sup>87</sup>

從到達江戶第二年勸勵源光國實踐孔子「大同」理想，第三年定義「高枕」是治定功成，第四年說戶戶絃歌的景象「彈指可冀」，第五年認為最終的園林隱逸唯有「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五年來朱舜水一心所繫顯然不再是個人出處進退或是遺民復明反清的問題，甚至也不只是關於某個君侯、特定邦國的問題，而應當是聖人之學或儒道聖教不分疆域、族群如何普遍傳布的更深層文化議題了。

84 參考《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474 姦臣傳，頁13779-13786。

85 陶潛，歸去來辭「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引自楊勇《陶淵明集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7，頁267）；而「南風」傳為虞舜之歌，《史記》，卷24 樂書「故舜談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頁1235；《世說新語》簡傲篇第13則記載王子猷任職卻不治事，桓沖相詢，答以「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表現卓犖不羈之性（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583）；「十畝之閑閑」出自《詩經》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描寫退隱歸田的自得之貌。

86 據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丁未年（永曆二十一年，1667）「上公構高枕亭於綠岡，又使（舜水）志其亭」，見《全集》附錄，頁320-321。

87 引自《全集》，頁228-229。

## 五、遊後樂園賦：另一種自我詮釋

人生中所關注議題的轉向，當然不會只是議題本身的重要性，這同時也是身分認同與生存領域的轉換。尤其朱舜水處在兵荒馬亂、風雨飄搖的明清之際，再加上先前乞師海外，或日後流亡異邦，外在環境的更迭變換必然有具體或無形的力量逼迫他要表白身分，要面對不同質疑，要做出不同的抉擇。因此，朱舜水的一生其實很難僅用一種角度就呈現完整，同樣地，即使只是一篇《遊後樂園賦》，也必須放回去曲折起伏的一生，才能看出深層的文脈情境。

同樣身為明末知識分子，面對家國興亡，朱舜水從來也沒有迴避生與死或者殉國與否的問題。而且他的問題還不只是中國境內的抗清或降清，甲申難後（1644年，崇禎帝死，清兵入關），舜水一方面因兩次徵召不就，而帶罪逃亡；一方面奔走海外，來往安南、日本，尋求外援以復明抗清，這當中至少有仕／不仕、死／不死兩大問題要面對，而且是每到一個異國就必須再次面臨。關於仕進，為什麼不應南明徵召？既而可以不受安南王威脅利誘，後來為什麼又接受日本宰相源光國的邀請？關於殉國，為什麼沒有像知友王翊力盡而亡？為什麼留居長崎後，眼見明室已無可振復，卻未能與國共亡？出處與生死是如此交纏錯雜的行路迷圖，對於明末知識分子而言，這種壓力隨時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歧路岔口：生命的樣態（如何）與終結（為什麼）都需要一種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的解釋。

朱舜水留居日本後，安東守約曾經問他在明末為何「徵辟不就」，舜水表白自己亦是功名之士，哪裡不知道這是入朝拜官的機會，但是奸相馬士英當國，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恐有背恩負義之譏，如此「見得天下事不可為，而後辭之」，並不是「洗耳飲牛」、「閉門養高」，以徼清譽。<sup>88</sup>所謂「天下事不可為」，朱舜水曾經這樣比喻：

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為他人認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為也。故忍死不為耳。<sup>89</sup>

88 參見 答安東守約雜問，頁182。

89 答小宅生順，《全集》，頁59。

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預籌於曲突之先，支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沽名養高。<sup>90</sup>

朱舜水早在「弱冠」之齡，就因「世道日壞，國是日非」而「絕志於上進」，<sup>91</sup>並不是甲申或弘光年間的徵召下來，才故意顯示高蹈之志。因此前引資料裡，朱舜水一再強調天下事所以不可為，是因為萬曆、崇禎以來江河日下的時局，讓他看清獨力難挽頹勢，卻又不免代人認過受誣詆，末世亂局裡並無法抱持知識分子傳統的用世之心，發揮不了作用的仕進是他前半生寧可違命逃亡也不接受的出路。

換言之，認清情勢、判斷時機的可為或不可為，是比盲目仕進求用更形重要。同樣的原則也表現在困於安南時期的生死抉擇。當時安南王檄取識字中原人，舜水被迫面試作詩寫字，舜水既不作詩，後又因不下拜而觸怒國王，面臨死亡的威脅，舜水曾經這樣考慮，死亡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徒死亦不足以明心」，<sup>92</sup>因此雖然自裁可以免受污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sup>93</sup>所以他一方面在安南朝廷之上，安南王之前，往復辯折，以明其心跡；<sup>94</sup>另一方面則密草奏疏上魯王，「惟恐身名埋沒於外夷，而無達於天朝」，<sup>95</sup>疏文中說到：

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為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尚有一季陵為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sup>96</sup>

在這裡舜水說明的其實不只是受困安南的情況，而是崇禎帝死後所以不就徵召，而遠走海外的緣由。深知在朝不可為，所以經營海外，乞師求援，顯然他也並不認為清兵入關後只有消極殉死一途，反而是積極地投入復興事業。但是，意外困於安南，眼見多年經營徒勞無功，又受辱夷廷，「靜聽一死」終於無法避免。對於這個時期的朱舜水來說，沒有官職身分卻一樣表現對於

90 答源英光國問先世緣繇履歷，《全集》，頁171。

91 參見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317。

92 安南供役紀事 自敘，《全集》，頁303。

93 安南供役紀事，《全集》，頁303。

94 見前註92、93。

95 引自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319。

96 引自安南供役紀事，《全集》，頁315。

家國興亡的責任承擔，沒有蒙恩受祿卻一樣以中華之臣抗禮於夷廷；因此單單問一個遺民最後有沒有殉死是不夠的，顯然還應該進一步從死亡構成的意義與價值去論斷。<sup>97</sup>

朱舜水逃過安南這一劫難後二年（1659）隨鄭成功北伐失敗，又開始了另一段流亡日本的旅途。亡國之民身居他鄉，為什麼沒有殉國以及可不可以效力異邦的問題再次接踵而至。至江戶第一年，源光國曾因世子謂舜水為翰林學士，而疑其為明朝顯宦，舜水答以自己「乃明室一書生耳」，並說到：

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尚敢覲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明朝儋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sup>98</sup>

這段說辭辨明自己不但不是顯宦，即使只是微官小吏，只要曾受朝廷點滴之恩，也絕對不會偷安苟活；換言之，是否曾在朝任職為殉國的基準，舜水兩度不就徵召，從未領受明朝俸祿。這個標準顯然切合於舜水面對清兵入關並未立即自盡，而逃遁至安南的抉擇。安南供役紀事 中更清楚說到：

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近以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干常，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之丘。文莊公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以逃遁至此。<sup>99</sup>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所謂「遠人義不當死」，正與他答覆源光國若身受皇恩則須與國共存亡的說法前後一致；其次，因為「義不當死」，所以隱逸逃遁成為接下來可行的出路。這也可以解釋後來北伐失敗後，沒有如同知交王翊力戰殉國，而東渡日本的緣由。

朱舜水在 祭王侍郎文 之二、之三，<sup>100</sup> 盛讚王翊盡忠全節，並認為

97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談到明季士大夫總要先抉擇生或死，之後才是殉國、起義、歸隱或仕敵的取向，而像是如果起義失敗又會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第8章 結論 則分別出兩種殉國類型：消極殉國是指為顧全個人名節的自殺行為；積極殉國則是承擔復興重任而持續反抗至於失敗被殺。其中並且引用朱舜水 答安東守約（按：《全集》頁75）評論文天祥不若張世傑「日夜裹創力戰」，說明明代士大夫對於積極殉國的高標準連文天祥也無法企及。頁216-217。

98 答源光國雜問，《全集》，頁167-168。梁啟超《年譜》繫於乙巳年（永曆十九年，1665），頁42。

99 《全集》，頁311。

100 朱舜水 祭王侍郎文 共三篇，後兩篇作於受困安南（丁酉，1657）及北伐前一年（戊戌，1658）。見《全集》，頁244-246。

「臣之所以事君，忠為上而功為次」，王翊雖身死，然忠義之氣磅礴天地，昭回古今，歷萬載而不朽。<sup>101</sup> 而朱舜水既然因「義不當死」的書生身分而流亡海外，顯然不是從「忠臣」這唯一角度——殉國（包括立即自盡或失敗被殺）與否來省視自己。舜水於是在解釋自己為何沒有與明室俱亡之後，向源光國這樣剖白心跡：

僕以上公為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為萬古之光，以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以贊襄萬一，如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為非人矣。<sup>102</sup>

很明顯朱舜水為自己的江戶之行，提出襄贊教化這個理想；而實踐這個理想可以說是他在明末絕意仕進，在安南堅拒官位之後，感念源光國的知遇，相信水戶侯的德操勤治，第一次願意應聘任事。對於這個決定，他毫不保留地說是「人生之大願」：

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sup>103</sup>

從這個行王道於天下的願望來說，舜水自己執守的是一個有別於「忠臣」的「志士」身分，近似孔子標舉的「士志於道」的君子典型。<sup>104</sup> 當然，不用於中國而行道海隅，令人油然記起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sup>105</sup> 的感嘆；國無賢君，邦則無道，孔子浮海之歎原有何去何從的茫然失落，兩千多年後，在朱舜水身上卻體現為亡國遺民的人生新路。

## 六、結語

正是從一個「行道志士」的立場出發，到江戶第五年，朱舜水以一種歡欣自得的語調寫下《遊後樂園賦》，挪借《上林賦》的盛世氣象，象徵自己所

---

101 全集，頁 246。

102 註 98，頁 168。

103 答小宅生順問，《全集》，頁 202。此處文字用以解釋自己對於光國卿之請並非有意推托，而是日本惑於邪教，若君相無整頓之決心，恐怕非一、二儒生所能挽回。

104 《論語》里仁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下一則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引自朱熹《四書集注》論語卷 2，頁 12。

105 《論語》公冶篇，引自《四書集注》論語卷 3，頁 2。

輔佐的光國卿與所指導的水戶學派在日本文化及政治上已經造成的影響與貢獻，而在此年步入七十歲的朱舜水其實也藉著《遊後樂園賦》表現出某種功成身退的告老心境。但是告老之後，如何還鄉？同年《答奧村庸禮》書中，舜水有極為通透的認識：

不佞今年七十，擬於舊冬告老。上公不允，謂不佞客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日夕親近之人，到寓備言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要君微名矣。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以養生耳。目下擬作身後之事。<sup>106</sup>

對於終身堅持著明朝衣冠的朱舜水而言，<sup>107</sup> 清虜盤據的中國早已不成為家；中原雖是故鄉，自己卻早與毀冕薙髮的中原人大不相同。七十歲開始準備身後事，次年（庚戌，1670）以檜木製妥棺槨，曾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然而一旦老病不起，「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sup>108</sup> 因為具有如此體認，《遊後樂園賦》透過大賦體式所展布的格局，明顯有別於一般遺民書寫總是「黍離之悲」、「新亭對泣」等「危苦之詞」<sup>109</sup> 的單一型態；除了流離逃遁、懷歸望鄉，<sup>110</sup> 《遊後樂園賦》為本來已經無路可出的流亡生涯，朗現一片柳暗花明的喧鬧春意。那是朱舜水歷經生死、仕不仕的抉擇關隘，甚至走上不歸路後，終於看見的華美風景。

106 《全集》，頁 93。

107 朱舜水不但自己奉行（自製明室衣冠，見《舜水先生行實》，頁 322），甚至要求來探視他的孫兒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另作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裳，一件不許攜入江戶」，見《答王師吉》，《全集》，頁 20。

108 引自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 321。

109 《詩經》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序以為詩人過西周舊都，見宮室荒蕪，無限悲憫之作（見《十三經注疏》之《毛詩注疏》卷 4，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 147）。《世說新語》言語第 31 則「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71）。庾信《哀江南賦》序曰「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倪璠《庾子山集注》卷 2，臺北：中華書局，1968，頁 3 上）。

110 朱舜水留居長崎初期就反映這種心境，除了本文第一節所述，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亦記載「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全集》附錄，頁 320。

本文曾於國立中山大學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合辦之「跨越邊界 / 第二屆文藝與文化研究國際會議」之「旅遊、流亡、遺民」專題中宣讀（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0年5月27-28日）

## The Scenery of the Exile — Chu Shun-shui’s Writing of Political Exile and the “Roaming in the Koorakuen Garden *Fu*”

Yu-Yu Cheng<sup>\*</sup>

### Abstract

“Roaming in the Koorakuen Garden *Fu* 遊後樂園賦” was completed in Chu Shun-shui’s 朱舜水 fifth year at Edo and displays a pleasing, comfortable tone. In this *fu*, Chu appropriated vibrant and glorious scenes from the “Imperial *Fu* 上林賦”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s of the Mito School 水戶學派 that Chu led in Japa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Fu* style is clearly distinct from most other writings of exiles, such as “Sorrow of the Song Shu-li 黍離之悲” or “Facing Each Other and Weeping at Hsin-ting 新亭對泣,” which cannot shake off images of poverty and difficulty. In contrast to such images of destitution, homelessness and homesickness, “Roaming in the Koorakuen Garden *Fu*” opened a window for the future of an exile and the splendor that followed when he experienced and overcame the enigma of personal death and political piety.

**Keywords:** “Roaming in the Koorakuen Garden *Fu* 遊後樂園賦,” Chu Shun-shui 朱舜水, writings of political exiles, *fu* 賦, Mito School 水戶學派

---

<sup>\*</sup> Yu-Yu Che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面積 壹萬九千七百坪  
縮尺 ——

圖三 後樂園平面圖 (摘自《日本庭園史圖鑑》)

後樂園平面圖

昭和十三年七月調査

